

我与“关中·外缘”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

龐毅 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此刻我正坐在西安到重庆的火车上，当火车快速地穿梭在秦岭山脉中之时，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过去十余天研习营上课、参观、调查和讨论的情景。研习营结束了，我心底里生出了几许浓浓的不舍。我多想与大家再多待几天，再彼此深入地讨论，哪怕是对我展开猛烈地批判也好！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想纪念这场学术盛宴的最好方式便是写下一点东西。

老实说，我是抱着再当一回学生的学习心态而来。去年博士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身份一下子由学生变成了老师，随之面对的是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曾经一颗心无旁骛的学习之心被事业和家庭搅动了。当接到李胜振老师的电话，通知我被正式录取为研习营员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这将是我现在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敞开心扉，全身心投入到此次活动当中。赴营之前，我便尽可能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了提供的学习材料。但当研习营开始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准备的还是不充分。

在营期间，每天的学习安排都十分紧凑，一天下来不由得有些疲惫，但我却乐在其中。在专家授课的日程中，一方面自然是领略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专家的风采，从他们的讲授中获得知识，体悟研究方法，一方面也在思考他们是如何建构自己的一套说法，有哪些可能存在的漏洞，比如材料的选择与解读，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紧密，结论与论证是否一致等。进而向老师提问，与营员交流，在小组和全体讨论中总结与反思。我最喜欢的环节是小组讨论，这个时间真的是一种享受，在这里可以直接而有效地展开讨论。大家各自分享发现的问题，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提出不同的看法。尽管最后大家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但仍可以发现彼此对学术研究存在一些共识。比如，回到历史情境认识人与事，而不是从现在的认知去解释当时人的行为。在进行历史解释时，所用的材料是否足以支撑论点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质疑别人的研究时，可能存在误读的可能。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自身想看的文本（研究或历史），而忽视整个文本中的其他内容，以及如何有效解释文本等问题，都对我的研究有不少启发。

通过参观与调查，刷新了我对西北历史的认识。虽然在历史课本和影视作品中看到了不少关于秦汉以降西安的历史，但当真正走进汉阳陵、周原、固原和西安等处博物馆后，却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能正

是同样的有感而发吧。先秦到汉唐间，以今天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在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考古发现的各种器物便是明证。不过，现在博物馆中所呈现的关中仅仅是历史上关中的很小一部分。我们知道，博物馆所陈列的物品，是通过选择所谓最精美的遗物进行排列，试图说明本地过去的辉煌。这些呈现并非历史的再现，我们很难看到普通民众所使用的东西，也无法探知民众生活的历史。刷新我对西北历史认识的主要是周公庙和西安碑林。周公庙和西安碑林保留了距今一两千年的碑刻，并且在不同时期先后有不同碑刻的汇入。由此，我深深地感受到西北历史的厚重，历史传承的伟大。要知道，我所研究的长沙，很难看到延续如此之久的碑刻了，宋代的故事多是传说，更别说隋唐及其以前的历史了。在赞叹之余，我也认识到自己现场读碑能力的有限性。这次调查和阅读的碑刻大多是明清及其以前的，由于我对该时期的制度和政治知识的匮乏，很多概念不甚明了，所以很难进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读碑时就感到十分吃力。通过调查，尤其是在固原的调查，改变了我对西北概念和历史的认识，并让我重新思考“中心和边缘”的分析框架。固原是明代的九边重镇之一，是藏传佛教、卫所、鞑靼等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之地。而现在的固原却是在祖国的中间，也就是说，现在的版图束缚了我对固原的认知。分析历史上的固原，显然“中心与边缘”的分析框架可以在这里有效实践。通过研究所谓的“边缘”，不仅是解释“中心”最好的方式之一，也可以把“边缘”的地区变成学术的“中心”。

生活经验告诉我，当数年之后回首过往，我可能会遗忘具体的上课和讨论内容，但肯定不会忘记结识的人和参加的各类活动。学习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会内化到我的知识结构中，所以上课和讨论的具体内容很难被唤醒。但这次研习中结识的各位朋友，观看的秦腔表演以及欢送晚宴上的歌曲串烧，则会被铭记，他们甚至会构成研习营的主要记忆。秦腔表演，皮影和华阴老腔都是我第一次观看，让我感受到了舞台上的西北风情。欢送晚宴上周浩的昆曲，刘冰欣的秦腔，王兴、孔军的朗诵，黄菲老师、李仁渊老师、张侃老师、王鸿泰老师、李胜振老师、胡箫白、范雪、黄庭硕、黄旨彦、吴挺誌、李松骏、何幸真、尹敏志、王欣睿、马栋予、韩树伟、周明帅的歌喉，让我看到了他们生活的一面。结识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则将是我今后学习和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田野导师黄菲给我的指导，组长孔军的包涵，以及小组成员吴挺誌、李奇鸿、许恺容、范雪、彭志、韩树伟和夏欢的帮助！